



## 演进成人

□ 卢敦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三四十岁时,迷恋过一阵乌龟和剃刀。所谓乌龟,就是《周易》,卜筮不是经常在龟板上做的么?而剃刀,聪明的读友应该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奥卡姆剃刀。《易经》有一句,道是“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意思就是水流千里终归大海。而奥卡姆剃刀法则,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说的是简单的解释最为正确。

那时候,看见复杂的东西就摇头,并且认为复杂且多余。年过五十后,慢慢地不再那样想了。水流千里,大部分是流到了大海,但有些直接被蒸发了,不少还被各种动物包括人喝掉了,可能还有一部分被大自然的搬运工搬走了。许多时候许多人许多事并不一定是冲着—个明晰的目标去的,而且既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归宿,不一定都会到罗马。

至于简单化原则,也可以胡搅蛮缠一番:如果真实生活的设计全按此原则,那么城市里边为什么要有很多个十字路口?一个足矣。一个大城市,从东往西,从南到北,人们总还是想多修几条大路,甚至高架、隧道。一方面是确实有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考虑万一哪天哪条路坏了,可以有别的路啊。当然,作为解释学的剃刀原则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两天在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前主任伊恩·塔特索尔《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这种感受更为强烈。在这个不少人感兴趣的人类起源问题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清晰无误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目了然的,即使是在拥有了不少动物化石的和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

比如说,以什么标准可以断言猿变成了人?大家或许在想肯定能找到一个解剖学特征,具有这个特征的肯定就是人。确实,这种思维方式产生过许多标准,但它们随后又皆被推翻了。早在1891年,荷兰医生杜布瓦第一次发现“爪哇直立猿人”,就将直立行走定为人的标准。随后,脑容量的大小成为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再后来,能不能制造工具成为主流标准。又后来,牙齿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但最近,直立行走的观点又回来了。

为什么?因为每个标准都遭到了强烈的挑战。

就说脑容量,曾经有学者以750毫升作为人与非人的分界线。但事实上,现代人的脑容量大抵从1000到2000毫升不等,同理,古老原始人的家族中个体的脑容量有时也相去甚远,你认定其中一个到了标准的是人,但他的儿子的脑容量完全可能小于750,反而不是人了。而制作工具,人们已经在塞加内尔的丰戈利观察到黑猩猩捕猎躲在树洞里的从猴的场景:它们会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除去枝杈、树叶,剥去树皮,有些黑猩猩还会用牙将树枝的顶端咬得更尖,这样就制成了一根18英寸至3英尺长的木矛。然后,它们将木矛有力地插入树洞,然后收回来看看上面有无血迹,闻闻是否有异味。如果有,就将树洞打破,用手去掏出从猴吃掉。

几乎每一个标准出台后都会遇到类似的挑战。今天还有一种流行甚广的看法: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猿猴被迫从森林来到草原,所以开始直立行走。但许多事并不一定是环境影响的直接结果。此书指出:“鸟类的祖先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拥有了作为皮肤毛囊变异结果的羽毛,但是一直没有飞起来。类似地,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在仍然完全水生的时候,就已经长出了腿”。要确定结构与功能的联系真的很难!

尽管这样,作者还是讲述了原始人的演化过程,特别是指出了各种观点的依据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关于现代人——智人,给出的章节标题是“谜一般的登场”,而最确切的结论,是智人起源于非洲。原先的地球支持几种不同类型的原始人共存甚至共同生活在同一地方,但自从智人出现后,其他原始人种就彻底消亡了。如何及为何消亡,今日尚不可知,但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人类的排他性如此强大,让万物颤栗!

而智人最根本的特征,在作者看来,是将现实世界符号化并将其处理的能力。“这是认知能力和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史无前例的质的飞跃。”“智人完成的这个惊险一跃——从一个无符号、无语言的物种转变为一个符号化的、语言化的物种,堪称地球上一切有机体出现以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知转型。”“事实上,就我本人而言,我非常愿意设想,最早的语言是由孩子们创造的。”最后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曾在尼加拉瓜观察到完全不曾接受过教育的聋哑儿童的年龄分组情形,他们自己会在交往中新创一种语言,而且更小的孩子比大的孩子能创造出更丰富、更严密的手语语言。

在作者看来,人类经验的铁律,一是每个人都会死,二是“非意图后果规律”,即我们总是难以预料我们行为的后果。

大脑的发育就是这样:“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凌乱地堆砌而成的历史产物。在我们的颅腔内,既装入了鱼类、爬行动物、树栖动物的大脑,也装入了最高级的前颌叶,它使我们能够以我们特有的方式整合信息。同时,我们大脑内部,一些较新的结构通过一些非常古老的结构进行‘交流互动’。我们的大脑似乎是一个临时建筑,不过是在几亿年间‘机会主义’地组装起来的……我们的大脑不可能是演化女神为了某种目的而精心微调的结果。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惊人的心理能力,只是因为自远古以来,我们无数的祖先,在应对当时的环境时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一些。然后到了最后,这个新获得的东西给智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仍然是未曾预料到的)。”

这样的—个结论说不上明晰、简洁,但我相信可能更近于世界的真实。

《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美】伊恩·塔特索尔著,贾拥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寻宋江南交游记

□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代,放眼古今,捭阖东西,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世。”陈寅恪的这一名言传之神州。有趣的是,我在一篇很学术的文章中,读到了现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1889—1975年)的妙语:“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汤因比只能活在“日不落帝国”的斜阳余晖里。

中外两公之精论与妙语,另当详述,笔者仅为此作点补白。有宋一代,与世界各国交游甚广、甚远,交友甚众、甚亲。史学家吕振羽指出:南宋沿袭北宋之制,不过,当政者还做了三件实事:除兴修水利以利农、聚北方南下之英才外,这第三件实事就是“发展了对外贸易”。吕氏之语铮矣。本文聚焦于“寻宋江南”之远洋,亦即对外贸易,落墨在“寻宋江南”之浙地,这自然是历史发展到其时之势然。宋开启于996年,自1127年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1127—1279年)”,只存在短短的152年,但决不能小看这弹指一挥间的一个半个世纪,它实现了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

南宋时,临安倚靠京都这一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势头异常迅猛,至南宋末年已有户籍39万,人口124万,百业兴盛,文化尤旺,影响深远,史载:“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南宋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更从一个侧面写尽了临安之繁华,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两宋时,尤为南宋,增强了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传统友好关系,开拓了与中亚乃至东非、北非的交往,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官方联系。为此,朝廷积极鼓励富商打造海船,大力发展民间的海外贸易。当时中国的远洋帆船穿梭于大海之上,川流不息,被史家形容为:“宋代航海业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兴盛景象”。出海远航之发达,是与造船和航海术水平相关联,宋代有当时世界一流的“造船匠”,吕振羽这样写道:“宋朝对外贸易的船只,不仅有用手摇橹的,还有了半机械化的,船下面有轮盘转动,船上有六七十人,船身可容几百人,载重很大……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都坐中国船。”由此可见,由于中国船优,也便于中外人士的同船交游。

其时的交游,也得到了各国政府高层的重视。比如日本天皇高仓于1170年曾接见宋商,又二年,他以法皇和他本人的名义,委托宋商向宋朝赠送礼品。日船入宋,与宋船相望于途,往来频繁,显现了一幅中日远洋贸易友好图。异邦使臣或商贾入华,也得到了宋朝皇帝的礼遇,进谒后,皇上有锦袍、束帛等礼品馈赠,比如1200年柬埔寨属邑真里富派使臣进谒,宋朝皇帝赠红罗绢一千匹,绀纁绢二百匹。

两宋时,与各国的交游地与集散地当属粤闽的港口名城广州和泉州。仅就浙江而言,明州(宁波)、温州是为前列。杭州是南宋之都,各国使臣、商人及货物亦必云集于此。它虽不适于驶入海船,但杭州与明州两地,从999年以来,都设立了市舶司。杭州面临钱塘江,不便海船入杭,异邦之海货大多从余姚经越州(绍兴)而入杭城的,可见,京都的威势不可小觑也。

“寻宋江南”,出口贸易之大宗,当数丝帛和瓷器,外销遍及世界各地,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上“陶瓷之船”的运销,也把中国人的友情、中国的文化传播世界。“南宋朋友遍天下”,此语信然?只说一例,宋瓷碎片曾在意大利出土,渗入了地中海和欧陆。前些日子,由上海《新民晚报》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寻宋江南话宋瓷》的线上直播,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克伦与大家一同探究了宋瓷的一些热点问题,听众反响热烈。他近著《瓷器中国》,览之或可领悟出宋瓷是“寻宋江南的美学代表”之三昧。

行文至此,我忽然又想起了文首提到的汤因比,想到了他褒宋的妙言。倘笔者能与汤氏作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我问:阁下看完这篇小文,对你的金言还有什么修正吗?汤因比回答:有,稍作修改,这就是:“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南宋江南钱塘江畔的临安,而不愿活在现代泰晤士河畔的伦敦。”

# 晚潮专栏



陈骥

你写,我来发



·看好文,写好文,来这里·